



1919—1949

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



· 概论 · 诗文卷 ·



0385/05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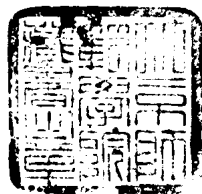
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

(1919—1949)

概论·诗文卷

牛 仰 山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168696

责任编辑：陈泽镛
责任校对：钱林娜
封面设计：鹿耀世
版式设计：李玲玲

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

(1919—1949)

概论·诗文卷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行

总 经 销 处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9.5印张 430千字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 200册

ISBN 7·5004·0263·5/I·28 定价：4.95元

内容简介

本书选编了1919—1949年间关于近代文学研究的文章三十九篇。上卷为概论卷，下卷为诗文集。这些文章都有一定的代表性，所论内容有：近代文艺思潮、文学派别、文学社团、翻译文学、重要的作家作品和文学史实等。本书所选文章，反映了我国早期研究近代文学的情况，具有一定的史料和参考价值。

编 辑 说 明

本书收录了1919——1949年间近代文学研究的论文和资料中较有代表性的一部分。这些文章，是从这三十年间发表于各种期刊和部分报纸上的数百篇文章中选录出来的。凡有单行本的专著皆不收录。个别文章过长的，在选录时做了必要删节。

所选文章按类编排。每一类文章，一般以发表时间先后为序。有关作家作品的研究文章，以作家生卒年代的先后为序，同一作家的文章则尽量归在一起。

选录的文章除明显错别字、异体字外，一律不作改动。有些文章有几种版本，而作者又作过修改的，尽量选用修改后的版本。

由于原文有些没有标点、断句，有些虽加了标点，亦大多不合规范，因而大部分文章都重新作了标点。

由于编者所见资料有限，编选亦难免有不当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前 言

近代文学作为古代文学的结尾和现代文学兴起的准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研究近代文学的兴起与发展，剖析它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所出现的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有所区别的特点，以便进一步探索和总结它在我国文学发展中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作用，这是文学研究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但是，中国近代文学萌生和勃兴之日，正是鸦片战争以后时代风云激烈多变之时。社会的动荡不安，除少数大作家尚有专集之外，多数作家的作品则散在四方，散佚严重，这给对它的研究带来不少困难。然而，当我们从各个图书资料室的书刊中把从“五四”运动到建国前夕研究近代文学的论文、资料作了一番粗略的检索后，出乎我们的意料，建国前我国的学者在一是“材料不易得”，二是材料“过多过杂”，三是无现成材料“依傍”的情况下，却以一种披荆斩棘、百折不挠的勇气与毅力，对近代文学进行了艰辛的开拓与探索。据不完全统计，建国前三十年间学者们在各种书刊上所发表的论著，除专著而外，单是论文、资料（限于概论、诗文）就接近二百篇。这本文集所收录的文章，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建国前学者对近代文学的研究取得了哪些成绩，存在什么问题，还有哪些问题需要继续探讨呢？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①近代文学是我国社会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以后发生巨大变化的近代现实基础上产生的。所以，近代文学从龚定庵、魏源到黄遵宪、梁启超，再到秋瑾、章太炎和“南社”的一批进步诗人、作家，他们的诗文创作，都是面向现实，反映现实，充满了反帝爱国和民主主义精神的。这是近代文学发展中的主流。

正是如此，前人对近代文学的研究，首先是考察它的思想内容是否反映了近代的社会现实，是否与那个时代脉搏跳动相一致。黄遵宪是近代诗坛上杰出的诗人，他的诗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是极其广泛的。但有的论文指出：“翻开《人境庐诗草》来，最触目动心的是那些爱国诗歌。”^②又指出：黄诗中的《逐客篇》、《冯将军歌》、《番客篇》、《悲平壤》、《东沟行》、《哀旅顺》、《降将军歌》、《台湾行》、《度辽将军歌》等，“有的歌颂中国将士的忠勇，有的讽刺守土将官的临阵逃敌，有的便替亡国的人民哀歌长叹。”^③这样的评论尽管还不具体，但却发掘出黄诗的精华，肯定了黄诗所以为人称赞的根本原因。

其实，为近代诗坛放出异彩的诗人和他们的作品，何止是黄公度一人。柳亚子说“时流竞说黄公度，英气终输仓海君。战血台澎心未死，寒笳残角海东云。”^④的确，丘逢甲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624页。

② 葛贤宁：《近代中国民族诗人黄公度》，《新中华》1934年第2卷第6期。

③ 质灵：《黄公度的新派诗》，《国文月刊》，1945年第35期。

④ 柳亚子：《论诗六绝句》。

“战血台澎心未死”的云凌壮志，和决心为收复失土台湾用血泪写成的诗篇，在一定程度上是超越了黄公度的。因为丘逢甲既是诗人，又是战士。以战士而兼诗人的作品，生活的气息是浓烈的，对于现实生活的体验是深刻的，诗所表现的思想内容是深厚的，诗的气魄是宏伟的。梁国冠在《台湾诗人丘沧海评传》中虽未对丘逢甲爱国的诗篇作详尽的剖析，但是，却指出丘诗中的“英气”毕竟是高于黄诗的。

还有1902年之后，那些“群集异国”的青年志士的诗作，象蒋观云的“世人皆欲杀，法国一卢骚，……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①从艺术上说，“诗固不佳”，但从思想和影响上说，却是“时代的信号”。^②默士的《绿裳招饮席上共谈北事》八首，邹崖逋者的《庚子围城杂感》，蜀郡辕孙的《都内杂感》，出云馆主人的《感事》三首，都是以庚子事变为题材而抒发诗人忧国忧民思想情感的诗篇。它们有的“攻击朝廷的昏庸”，有的“咒诅顽固大臣的误国”，有的“记述联军入京、帝后西狩的惨状”，有的“讥刺刘坤一、记之洞的推诿责职和李鸿章的失策”，^③无一不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也无一不是具有鲜明的思想倾向。那个署名醒狮的《读史》三首，“其一咏嬴秦暴政的必然崩溃”，“其二咏吕雉武曌之必然铲除”，“其三咏荆轲一流人物的未免太少”，^④显然是借古讽今之作，和当时的社会现实结合得非常紧密。这些诗人既不知其真实姓名，也无从考察他们的生平事迹，然而，他们的诗“随处都以一种沉痛的情绪抒发着对于时事的感慨”。于是，诗评家就以“诗中隐隐埋伏

① 蒋观云：《卢骚》，转引自《诗界潮音集》。

② 杨世骥：《诗界潮音集》，《文苑谈往》，第1集，中华书局1946年版。

③④ 杨世骥：《诗界潮音集》，《文苑谈往》，第1集，中华书局1946年版。

着多少炸弹的声音”，①指出了这类诗歌的现实意义。

如果说，蒋观云的一些反映现实的诗可谓“时代的信号”，一批无名氏诗人的讽刺时政的歌谓之“炸弹的声音”，那么，把黄公度、丘逢甲称之为“时代的歌手”，把他们洋溢着爱国思想的诗篇誉之为“时代的鼓点”，在他们所处的时代来说，那是最恰当了。在文学发展史上，凡是被认为是“时代歌手”的诗人和“时代信号”、“时代鼓点”的诗篇，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时代哺育了诗人，使他们在社会变革的某个历史时期，就把眼光转向现实，密切地注视着现实的演变，关心着国家与民族的兴亡。这样，尽管有不少作家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是属于剥削阶级的范畴，有时也流露出对广大劳动人民的轻视，对农民运动诋毁的情绪，但是，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是非与善恶，特别是关系到整个民族国家存亡的大问题，就迫使他们不能不表示明确的态度。以黄遵宪说，他所以能够写出激动人心的爱国诗篇，如钱萼孙在《〈人境庐诗草〉笺注序》中所说：“先生之世……历甲午、庚子之变，朝市沧桑，边关烽火，凡可歌可泣可痛哭可流涕可长太息者，举以纳诸诗。”就是说，近代激烈多变的社会现实，是黄遵宪诗歌题材的重要源泉，而那些在诗人视野中发生的一幕又一幕的悲喜剧，直接地牵动着诗人的思想，促使他无法控制自己喜怒之情，把社会现实生活中“生的史实”摄取而来，经过他“那忧民活国心肠”的孕育，写出或者歌颂或者揭露的具有现实性强、思想内容深厚的诗，“使人读后，精神倍觉振作，爱国情绪也越加浓厚”。②再以那批“群集异国”的青年志士的诗说，在“形式上固谈

① 杨世骥：《诗界潮音集》《文苑谈往》，第1集，中华书局1946年版。

② 质灵：《黄遵宪的新派诗》，《国文月刊》，1945年第35期。

不到有所创造，然就内容而言，实使当日诗坛发放出曙光”。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生活上“饱尝颠沛流亡之苦”，又在异域他邦“自由地接受新的知识”，自然就会“感慨”万端，把他们对于时事的看法，“一一托之于诗”了。可见，诗歌之有内容，且又感动读者，并为世人传诵，为评者称赞，就是它与社会现实结合得非常紧密，符合了时代的需要。

诗是如此，散文也何尝不是这样。评论家把梁启超赞为戊戌变法前后舆论界的“骄子”，而梁启超的散文在当时能“风靡一时”，不胫而走，这不能单纯地视为“文体革命”的成功，根本的问题，是梁文所宣传的思想观点，顺应了历史潮流的发展，表达了广大爱国者的心愿，为时代所需要。因此，多少年来，思想界、知识界的进步人士，对于梁启超后来政治上的堕落是鄙视的，但对于他宣传救亡图存，主张维新变法的散文，却是肯定的。因为，他于戊戌变法前后在《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前期）上发表的文章，撇开他在文体改革上的功绩，单是他文中传播的思想，诸如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猛烈批判，对清朝腐朽制度的深刻揭露与抨击，对公羊派循环进化史观的宣传，对民权思想的介绍，等等，在当时的广大知识分子中间是起了震聋发聩的启蒙作用的，对于知识分子的觉醒是起了推动作用的。所以，郭沫若以其亲身的感受评论说：“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载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采。”^①郭沫若的看法虽对梁文思想有些过誉，但在晚清“萎靡闭塞”的时代，还是符合实际的。

^① 郭沫若：《我的童年》，《沫若选集》，第3卷。

但是，也有的研究者认为，在《湘报》上撰写政论文的樊锥，一向被论者所忽视，实则他所著“《开诚篇》、《发钢篇》诸文”，其“持论之激烈，见地之透彻，实出当时谭嗣同、梁启超诸人之上。”^①樊锥并不以文名，他的影响也没有梁启超广泛。但就他的《开诚篇》“发人之所不敢发”，

“主张从根本破坏着手”来“改革政治和社会”，而遭到反动文人的攻击和迫害，确实是“站在时代的尖端”的。他的文章“开阖自如，肆应不穷”，“字句间横溢着炽灼的情感，实开梁启超戊戌以后政论之先河，尤为难能可贵。”^②再看辛亥革命时期的章太炎，“世人只称道他《国故论衡》中的述学文章”，而很少“注意他那些鼓吹革命的抒情文章。”^③岂不知章氏的《民报纪念词》、《中夏亡国二百四十年纪念会书》、《讨满洲檄》诸文，都是“充满着民族主义色彩”的“声情激越”的文章。它们在推翻清朝统治的斗争中，是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的。因为“革命的成功，当然要靠着实际的行动，但文字的宣传，至少是在革命的进程上加了一鞭，促使革命早一点实现。”^④把文章的宣传鼓动看作是革命运动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实际上也是把文章所宣扬的思想放在首位，衡量它是否表达了广大人民的意愿与要求，并推动历史是否前进的具体阐述。应该指出，论者对章太炎政论文的高度评价，并不是“始作俑者”，早在吴文之前，鲁迅就曾说过：“……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化进分’，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

①② 杨世骥：《樊锥与苏舆》，《文苑谈往》，第1集。

③ 吴文祺：《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学林》，1940年 1941年（1—3辑）。

④ 同上。

要道’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①鲁迅的话，虽是追叙他当年亲近和崇敬章太炎的原因，然而，这个原因不是别的，正是章氏文章的战斗性，促使鲁迅对他产生了敬慕之情，并接近了这位民主主义革命者的。鲁迅称赞章文“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决不是个人一时的感受，而是章文战斗性和社会意义的根本所在。

其次，由于近代文学题材的扩大，思想内容上现实性的加强，作为表现思想的形式、语言以及风格，也出现了新的变化。林昌彝说龚自珍诗文的风格是“奇境独辟”、“别开生面。”康有为标榜他的诗是“意境几于无李杜，目中何处着元明。”这一切，生动地说明了近代文学在突破旧形式的束缚，向着新形式迈进的趋势和显示出的特色。因此，探讨近代文学形式、语言上的变化及其特点，就成了建国前学者们研究近代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方面。郑振铎说梁启超的散文“当然不是晶莹无疵的珠玉”，但他“以淹贯流畅，若有电力足以吸住人的文字”，和以“平易畅达”的文辞，“婉曲的表达出当时人人所欲言而迄未能言或未能畅言的政论”，^②正是他散文艺术风格的特色。

但是，梁启超在文体上的革新，和历史上任何一种“新学派初立”一样，并不是和平地自然产生的，而是经过一番激烈斗争的。梁启超认为，“凡一新学派初立，对于旧学派，非持绝严正的攻击态度，不足以摧故锋而张新军。”^③就他对文体的改革说，初则表明自己“夙不喜桐城派古文”，继而又严厉地批评桐城文是“因袭矫柔”。^④桐城派文既为

①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② 郑振铎：《梁任公先生》，原作于1929年，现据《中国文学研究》，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③④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他所憎恶，必然要突破旧文体的束缚，创造一种适合表达现实性较强的思想内容的新形式。而梁氏的这种新文体正好和“规律太严整，且亦声希味淡”的旧文体是对立的。所以“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新世学者却“竞效之，号为新文体。”这就看出：梁启超在文体改革上的胜利，一方面显示了他在散文艺术形式上的特色，另一方面，新文体的创立，“打倒了所谓恹恹无生气的桐城派古文，六朝体古文”格调和程式的束缚，使散文体获得初步解放。影响所及，“一般的少年们都能肆笔自如，畅所欲言。”^①从近代文体改革运动的情况说，吴其昌以为：“当年一班青年文豪”，象谭嗣同、夏曾佑、章太炎、严复、林纾、马其昶、陈三立、以至章士钊等，“各家推行着各自的文体改革运动”，但平心论之，谭嗣同之文，“学龚定庵，壮丽顽艳，而难通俗”，夏曾佑之文，“杂以庄子及佛语，更难问世”，章太炎之文，“学王充《论衡》，高古淹雅，亦难通俗”，严复之文，“学汉魏诸子，精深邃密，而无巨大气魄”，章士钊之文，虽“后起活泼”，亦“忽固执桐城，作茧自缚”；只有梁启超的散文，才象“雷鸣怒吼，恣睢淋漓，叱咤风云，震撼心魄，时或哀感曼鸣，长歌当哭，湘兰汉月，血沸神销，以饱带情感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②吴其昌的评论，虽不免对其师在文体改革上的功绩有过誉之处，但是，梁启超散文艺术风格的特色，却是同时代的人都无与伦比的。不过，也有人认为，梁启超散文虽“笔锋常带感情”，

① 郑振铎：《梁任公先生》，原作1929年，现据《中国文学研究》，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② 吴其昌：《梁启超》。

气势奔放，只是“若长江、黄河，一泻千里”，纵有感人之力，而缺乏含蓄与蕴藉，还是章太炎的政论文，犹如“短小的匕首，尖锐锋利，有发必中。”^①这虽是对梁、章散文艺术风格异同的比较，但也看出论者的倾向性。

近代散文打破桐城“义法”桎梏，并使散文获得新生与解放的是梁任公，在诗歌领域高举“我手写我口”的革新旗帜，且在创作实践中以“方言俗语”入诗，又“不名一格，不专一体”的自然要推黄公度，这是历来研究黄诗艺术形式的学者共同的意见。然而，从近代诗的发展上去考察，能把“腐言烂调一概抹，又能独抒所见”，并“敢用俗语，不敢求高深、隐晦，脱却相习成风的旧诗的模式”，^②那是咸、同年间的江湜。如何全面地评价江诗，不是本文的范围，仅从艺术风格而言，江湜本人对他的诗是很自负的。诗人在《元日》中写道：“纵然天地虚生我，岂合文章再让人？一树梅花篱落外，冲寒须信有精神。”这“精神”的内涵容量是比较丰富的。从艺术风格上看，他主张诗“不足征典”，不作“模仿”，诗情要“真”，文字要“晓”。用江湜三十四岁时写成的《近年》诗来说，那就是：“近年手创一编诗，脱略前人某在斯。”所谓“脱略前人某在斯”，乃是他诗风的特征。他力图摆脱传统形式的束缚，自由抒写，务使读者“读上句时下句晓，读到全篇全了了”^③的风格，这在他的诗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请看：

一溪绿得可怜生，不是琉璃比不成；及到前滩惊泻处，琉璃

① 吴文祺：《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学林》，1940—1941年（1—3辑）。

② 韦坚：《略论江稚叔的诗作》，《文艺复兴》，1948年“中国文学研究号（中）”。

③ 江湜：《小湖以诗见问戏答一首》及《由常山至开化折回江山共录绝句二十首》，《伏散堂诗录》。

这种用白描手法写景，语极浅近，情景逼真，确实是一种新风尚。所以，前人对江湜诗风的评价是：“清末诗人黄公度尚不见得能够完全如此写法，而这位上去数十年的江先生竟有打破风气的‘创作’。”②确实不是过誉之言。

从翻译文学来说，在翻译理论上有所建树的是严复，而译述文学作品，在文笔风格上有特色的则是林纾。林纾用古文译书，尽管有些译作如梁任公所批评的，乃是“每译一书，辄‘因文见道’，于新思想无与焉。”③但其译文的风格，却是颇具特色的。这种独特之处是，他“对于原书的诙谐风趣，往往有一种深刻的体会”，于是，每逢译述到这种地方，他总觉得原文描叙欠缺，就忘记了自己是在翻译，如同创作一样，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把他认为原书不满意处，往往用笔加以渲染，使原作的描叙更逼真、更生动，也更“精彩”。胡适说：“能读懂原书的自然总觉得这种译法不很满意”，④若从“修辞学或文章作法的观点来说，它常常可以启发心思”。⑤而且，在翻译史上，绝对忠实于原文一字不易的译作，毕竟是极个别的，增添或删减原文，甚至为使译文畅达在词语上润饰的则是多数。另外，古文中的语言是绝对不许有新名词和外来语的，但林纾译述的小说中却出现了许多新名词和外来语。倘说林纾主观上是恪守桐城派古文的“义法”，但在翻译实

① 江湜：《小湖以诗见问戏答一首》及《由常山至开化折回江山共录绝句二十首》，《伏菽堂诗录》。

② 韦坚：《略论江弢叔的诗作》，《文艺复兴》，1948年“中国文学研究号”（中）。

③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④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2集，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

⑤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文学研究集刊》第1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

践上却不自觉地在破坏“义法”。世人只因林纾不懂外文，仅凭口述者转译，因而任意删减原文，就批评这是一个严重的缺点，岂不知林译小说的文笔，还别有一种风味。

再次，建国前学者在近代文学研究上的一个突出的成就，就是对一些文学社团、流派以至作家的功过，也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南社是近代文学史上唯一的革命文学团体。评论南社的文章也并不算少，但“捧南社的讲它是如何有功于革命”，贬南社的“象胡适之博士”，却“以‘淫滥’两字一笔抹煞”，难怪柳亚子很感慨地说：“我觉得二十年来评坛上很少有持平之论”。^①所谓“持平之论”，就是既不“捧杀”，也不“骂杀”，而是按照它的本来面貌，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南社是什么样性质的文学社团呢？曹聚仁说：“十九世纪，可以说是个革命的时代。南社首先揭出革命文学的旗帜，和同盟会的革命运动相呼应。”^②其所以是“鼓吹革命的文学团体”，就因为“他们叹汉族的被压制，愤满人的凶横，渴望着‘光复旧物’。”^③它团结了一批“时代歌手”，写出了一系列慷慨激昂、活泼淋漓的诗文，紧密地配合当时的革命形势，“在反清反袁上是不无微劳的”。（柳亚子语）然而，南社中大多数成员，不能随着历史的发展前进，以至使这个社团出现分化，终至解散，也是无可讳避的事实。鲁迅深刻地指出：“希望革命的文人，革命一到，反而沉默下去的例子，便曾有过的”，^④南社就是其中的一个。不错，民国告成以后，南社的部分成员，也以诗文为武器，向袁世凯的倒行逆施的罪恶行径作过

① 柳亚子：《关于〈纪念南社〉》，《南社诗集》第1集，中学生书局1936年版。

② 曹聚仁：《纪念南社》，《南社诗集》第1集，中学生书局1936年版。

③④ 鲁迅：《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

斗争，甚至象柳亚子等极少数中坚分子，几经曲折仍坚持进步的，但毕竟寥寥无几。作为一个文学团体，辛亥革命之后，便失去了往日斗争的锋芒，显得“索然无味，不想执笔了。”^①考究其原因，固然很复杂，但总的根子是“他们抱着一种幻想，以为只要将满洲人赶走，便一切都恢复了‘汉官威仪’，人们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带，大步地在街上走。”^②这种狭隘的种族主义思想，限制了他们的视野，使他们不能再前进一步。

桐城派文虽不始于近代，但曾国藩掀起的“桐城中兴”，到吴汝纶、林纾等仍抱住桐城派文法规不肯放弃，在近代文坛上的影响是很大的。就这个文派的文学主张、文学创作的总体说，到了近代，象梁启超所指出的，“以文而论，因袭矫揉，无所取材；以学而论，则奖空疏，闳创获，无益于社会。”^③是近代文界的逆流，是应该全盘否定的。虽如此，也应做出公允的评价。吴文祺以为，“桐城派文的优点，是清淡简朴，不加雕饰。缺点是内容空虚。及其末流，只能模仿，作文若填匡格，简直成了变相的八股。”^④这个看法，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

论到对作家的评价，有许多观点是既中肯又妥贴。大体上包括了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充分肯定一个作家在近代文学史上的功绩与地位。例如，《严复先生评传》中指出：严复是（1）西洋留学生中在翻译史上有贡献的第一人；（2）发明翻译西籍必须遵照“信、达、雅”标准的第一人；（3）翻译之书于中国政治社会学术思想皆有极大影响的第一人。二是从

① 鲁迅：《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

② 鲁迅：《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③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④ 吴文祺：《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